

自由與病毒

——紀念黑格爾誕辰二百五十周年

按照黑格爾的自由理念，政府基於理性的原因採取封城令、禁足令、居家令或社交禁令，並不是對自由的限制，而是對任意的限制。示威抗議是社會衝突與異見的一種表現方式，但是為了「個人自由」而反對政府的防疫措施，不是基於理性的思考，而是違反普遍意志的任性。

黃鳳祝

進入秋冬，歐洲各國紛紛陷入新冠病毒

毒的第二波疫情。隨着疫情的長期化，不同社會群體對於疫情的看法不斷裂變，歐洲多地爆發了反對防控措施示威遊行，抗議政府限制公民自由。為了應對全球瘟疫的蔓延，國家的限制措施可以持續多久？在圍繞病毒與自由的討論中，黑格爾

（一七七〇—一八三一）的自由哲學引起西方思想界的關注，他的自由理念也為西方政府實施危機管理提供了理論支撐。

今年是黑格爾誕辰二百五十周年。德國耶拿大學哲學教授克勞斯·費威格

（Klaus Vieweg）出版著作《黑格爾——

自由的哲學家》（Hegel: Der Philosoph der Freiheit），系統闡釋黑格爾思想的發展。他認為，黑格爾的自由哲學值得當代重新審視和學習。

哲學家之死

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，時任柏林大學校長的黑格爾猝然離世，享年六十一歲。醫生宣布黑格爾死於霍亂。霍亂是法國大革命之後民族國家出現以來的第一場全球性瘟疫：一八一七年疫情首先在印度

爆發，之後蔓延到亞洲、歐洲和美洲，起伏綿延至二十世紀初。一八三一年霍亂疫情從俄國和波蘭進入普魯士，當時的柏林沒有污水處理系統，衛生設施不佳，導致病菌快速傳播。為了防止疫情擴散，普魯士當局下令關閉公共設施和學校，霍亂病死者必須於當日下葬，並在霍亂公墓進行集中掩埋。

為平衡各方面的政治利益，普魯士當局對哲學家之死採特殊處理。依照防疫條例，黑格爾的住所和靈車進行了徹底的消毒，但是葬禮允許延後兩天舉行，為此官方批文隻字未提霍亂死因。按照黑格爾的遺願，他的遺體葬於柏林市立公墓，與哲學家費希特比鄰而居。葬禮當天，為黑格爾送行的人流和馬車看不到盡頭。

黑格爾去世前後正是普魯士政局動蕩時期。一八三〇年，法國七月革命推翻了復辟的波旁王朝。一八三一年的霍亂大流行加劇了歐洲社會的分裂，貧民階層死亡率居高不下，市民階層擔心來自底層的暴亂，不同社會階層受疫情影響不同，對防疫措施的不滿導致陰謀論泛濫。在柏林，哲學與宗教的衝突加劇，青年學生公開反對普魯士國王和政府，主張進行政治改革。學生不願霍亂疫情和當局的壓力，追

悼黑格爾，主要是基於政治原因，他們把黑格爾的葬禮變成了反政府的示威遊行。

圍繞黑格爾的葬禮，發生了兩件不合規的事情：一是普魯士當局沒有按照嚴格的防疫規範處理下葬時間和地點；二是參加葬禮的人利用葬禮舉行了變相的示威遊行。哲學家之死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黑格爾自由理念的樣本。如果黑格爾確實死於霍亂，普魯士當局破例而行，就是無顧柏林市民的福祉，把葬禮變成特權者的葬禮。如果送別的人把追悼變成彰顯自身政治主張的遊行，無異於用特權反對特權，如此得到的不是自由，而是另一種特權。

理性與自由

黑格爾認為，自由是思考本身，意志只有作為思考的產物才是自由的。他在《哲學史講演錄》中探討盧梭思想時指出，把普遍意志看作一種偶然的任意，是對自由的一種誤解。普遍意志不是個別意志的綜合，「普遍的意志必須是理性的意志」。他特別強調調說，在一個少數服從多數的機制中，是沒有自由的。黑格爾認為，真實的自由意志是理論精神和實踐精神的統一，也即是思想中的精神和行動中精神的統一；這兩種精神都必須以合理性

為導向，人才能夠理解和接受普遍意志，實現自己的自由。

《法哲學原理》中有一句話：“Was vernünftig ist, das ist wirklich; und was wirklich ist, das ist vernünftig.” (HW7:24) 商務版中譯為：“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，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”（黑格爾《法哲學原理》，范揚、張企泰譯，二〇一三，第十一頁）。我認為把「wirklich」譯為「現實的」，會產生歧義，而「歧義」本身是對黑格爾哲學不同理解所導致的問題。

這句話可以譯為：“合乎理性的必然成為真實的；真實的必然是合乎理性的”。因為語句的重心是指向理性與真實，而不是生活的現實。黑格爾認為，只有理性的事物，才有存在的理由，才會成為真實的存在；非理性的存在，不是真實的存在。非理性的存在必然會失去其存在的理由。在黑格爾看來，當理性決定意志時，才會產生自由。合乎理性的意志和自由，才是真實的自由，真實的自由必然是合乎理性的。

二〇二〇年五月以來，雖然各國政府相繼放鬆了疫情管控措施，但是在歐洲許多城市爆發了持續不斷的遊行示威活動。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，柏林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，數萬名示威者反對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，把矛頭指向總理默克爾，要求聯邦政府下台，並對德國議會大廈發起衝擊。

按照黑格爾的自由理念，政府基於理性的原因採取封城令、禁足令、居家令或社交禁令，並不是對自由的限制，而是對任意的限制。示威抗議是社會衝突與異見的一種表現方式，但是為了「個人自由」而反對政府的防疫措施，不是基於理性的思考，而是違反普遍意志的任性。新冠狂歡的參與者沒有維護其行動的權利，因為他們的任性行為從根本上侵犯了自由。

不損害他人福祉是普遍意志和普遍自由的前提。自由不是任意，自由是對他人意願的認知和包容，是對自己意願和行動是否合理的思考以及對普遍意志的理解和接受。離開他人福祉談論自由，無論是為個人還是群體爭取利益，都不是自由的行為。按照黑格爾的國家理念，國家存在的目的在於保障所有公民的自由，也正因為如此，國家出於理性的原因必須約束任意性的行為。

（作者為德國慕尼黑黑大學哲學博士。）